

代沟现象的社会学研究^{*}

周 怡

本文采用现代社会学研究中的问卷调查、个案访谈、等级相关分析及卡方检定等实证方法,对转型时期中国社会三代共世互动过程中的代沟现象作了客观可信的描述、分析和预测。主要的研究结论为:(1)代沟现象普遍存在于现代社会;(2)现存中国社会的代沟在主体上是一种适度的良性代沟;(3)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人们的代沟意识及对代沟现象的认可或理解程度将越来越明显。

作者:周怡,女,1956年生,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

所谓代沟是指由于时代和环境条件的急剧变化、基本社会化的进程发生中断或模式发生转型,而导致不同代之间在社会的拥有方面以及价值观念、行为取向的选择方面所出现的差异、隔阂及冲突的社会现象。80年代传入中国的代沟研究,曾经为研究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代际互动提供了绝好的开端。但综观国内学者的诸多论述,我们发现,人们对代沟观的“破”和“立”还没有完全形成共识,有关的实证研究也极为少见。据此,本文拟用定量与定性两种方法,通过对南京市10大城区人口的抽样调查和个案访谈,试图对中国社会现存的代沟现象作一实证探讨。

—

这项研究的样本来自南京市10大城区16岁以上的非农业人口。我们采取多阶段抽样方式进行问卷调查,实发问卷420份,回收有效问卷345份,回收率82.14%。

有时我们发现,对某些价值观的认同反应的差异并不能完全决定代际互动的状况,因为即使价值观或行为的选择存在一定的差异,不同代之间同样可以建立和谐、积极的关系。尤其在我们这样一个重礼教、重情感的国度中,这类事例举不胜举。代际关系的全方位性使我们想到,一个社会或国家内部的稳定和发展,关键并不在于代际之间是否存在差异或沟壑,而在于各代人的代沟意识及其对代沟的操作。据此,我们的问卷兼顾了两方面的内容,这就是,既有对不同代关于代际互动的评价及其代沟的宏观考察,又有具体的价值认同和行为选择方面的测试。调查分析结果如下。

1. “代沟”意识和评价

*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了童星教授的指导。——作者注

问题 1: 对两种 (社会与家庭) 代际互动状况的总体评价

	16—35 岁 (N=163)		36—50 岁 (N=100)		50 岁以上 (N=82)	
	频数	(%)	频数	(%)	频数	(%)
07. 目前整个中国社会不同代人的表现						
——非常一致	0	(0)	0	(0)	0	(0)
——基本一致	27	(16. 56)	20	(20)	24	(29. 27)
——存在较大差别	133	(81. 60)	79	(79)	56	(68. 29)
——根本对立和冲突	3	(1. 84)	1	(1)	2	(2. 44)
08. 您家庭内上下代的关系是						
——非常好	36	(22. 09)	13	(13)	11	(13. 41)
——基本和谐	104	(63. 80)	70	(70)	54	(65. 85)
——经常有矛盾	23	(14. 11)	17	(17)	17	(20. 74)
——根本对立和冲突	0	(0)	0	(0)	0	(0)

调查显示, 无论对整个社会还是对家庭内部的代际状况, 三代人所作的总体评价基本一致, 就整个社会而言, 填答不同代之间“存在较大差别”者占比例最多, 其次是“基本一致”。这表明, 社会生活中存在代沟现象这一意识已经为多数人所感触并接受, 其中年轻人(占 81. 6%) 较其他两代人(分别为 79%、68. 29%) 这种代沟意识更为强烈。对家庭内部的上下代关系问题, 三代形成共识的看法是“基本和谐”居首、“经常有矛盾”次之、“非常好”占一定比重, 但是没有人选答“根本冲突和对立”一项。这就是说, 在中国, 尽管人们已经意识到不同代之间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别和矛盾, 但是这些差别和矛盾在目前并没有造成代际间的严重隔阂和对立, 因为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 其内部代际互动的运行状况基本良好。

问题 2: 不同代人的相互认可性反应

	16—35 岁 (N=163)		36—50 岁 (N=100)		50 岁以上 (N=82)	
	频数	(%)	频数	(%)	频数	(%)
09. 青年、中年及老年人在生活方式上往往存在差异, 您认为						
——完全正常	104	(63. 8)	50	(50)	48	(58. 55)
——基本正常	52	(31. 9)	37	(37)	27	(32. 93)
——说不准	3	(1. 84)	10	(10)	4	(4. 88)
——不太正常	3	(1. 84)	3	(3)	3	(3. 64)

续问题 2

	16—35 岁 (N=163)		36—50 岁 (N=100)		50 岁以上 (N=82)	
	频数	(%)	频数	(%)	频数	(%)
——完全不正常	1	(0.62)	0	(0)	0	(0)
10. 一代人欣赏的价值观念, 有时另一代人却不欣赏, 您认为						
——完全正常	108	(66.26)	55	(55)	49	(59.76)
——基本正常	49	(30.06)	35	(35)	24	(29.27)
——说不准	4	(2.45)	8	(8)	6	(7.32)
——不太正常	1	(0.615)	2	(2)	3	(3.65)
——完全不正常	1	(0.615)	0	(0)	0	(0)

“代沟”现象能否得到各代人的认可, 是代际关系能否保持和谐的关键, 因为相互认可才会使得彼此求同存异成为可能。在我们设计的问卷中, 项目 09 与项目 10 就是分别从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方面的差异来对老、中、青三代进行的认可性测试。测试结果表明, 各代中占 80% 以上的人都认为: 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选择方面存在差异这是正常的。理智地对待代沟, 不强求一致, 也不无端夸大, 相互尊重和相互理解各代人的选择, 这是众多调查对象向我们叙述的心迹。无疑, 这种认同反应为代际沟通和跨越代沟铺设了坦途, 并进一步向人们展示了中国人代际和谐的乐观现状和前景。至少来说, 那种大规模的、单纯由价值观、行为取向的选择不同而导致的几代人产生根本分歧和冲突的现象, 目前尚未见端倪。

问题 3: 不同代人对“代沟”表现方面的认同选择

	16—35 岁 (N=163)		36—50 岁 (N=100)		50 岁以上 (N=82)		等级总和 R _i
	频数	等级	频数	等级	频数	等级	
11. 您认为目前不同代人的差异主要表现在:							
——拥有的地位或经验不同	32 (9.82)	5	16 (8)	5	13 (7.9)	5	15
——拥有的知识或能力不同	59 (18.10)	3	41 (20.5)	3	27 (16.46)	3.5	9.5
——情感生活不同	10	6.5	6	7	3	8	21.5
——目标追求不同	47	4	35	4	27	3.5	11.5
——价值观念不同	79	2	43	2	35	2	6
——生活方式 (包括消费、娱乐方式) 不同	83	1	45	1	45	1	3

	16—35 岁 (N=163)		36—50 岁 (N=100)		50 岁以上 (N=82)		等级总和 R_i
	频数	等级	频数	等级	频数	等级	
——选择职业的标准不同	3	8.5	4	8	4	7	23.5
——性格或气质不同	10	6.5	10	6	9	6	18.5
——其他	3	8.5	0	9	1	9	26.5

$$\text{肯德尔和谐系数 } W = \frac{S}{\frac{1}{12} K^2 (N^3 - N)} = 0.975$$

统计表明,“代沟”现象具体表现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拥有的知识或能力”、“目标追求”、“拥有的地位或经验”方面,这5项被选择的频数最大;而“选择职业的标准”、“情感生活”、“性格或气质”等方面被选择的机会较小。肯德尔和谐相关系数用来说明三代人对差异评定的一致性程度, $W=0.975$ 肯定了他们的选择具有很高的一致性。另外,从“拥有性代沟”与“选择性代沟”的区分来看,虽然属于选择性代沟一方的被选频数明显超过拥有性代沟,但是我们欣喜地发现,已经有20%以上的被试者注意到了拥有性代沟现象的存在。应该说,与较为表层的、显现性的选择性代沟相比,它是更深层的、隐性的代沟现象。

关于代沟意识及其评价方面的问题,我们在本项调查的态度度量(问卷序号第21项)中也有所涉及。当问及您是否赞成“经济腾飞会使不同代之间的差距拉大”时,大部分被试对这一说法持赞成态度,其中“赞成”的青年占27.6%、中年占31%、老年占34.5%;“基本赞成”者青年占19.63%、中年占30%、老年占26.83%;回答“说不准”的青年人占19.02%、中年人占16%、老年人占21.95%;另有10%和20%的人分别持“不太赞成”和“不赞成”意见。总的结论是:(1)无论青年、中年,还是老年人,他们中的大多数对这一说法持肯定的态度。说明他们对飞速发展的社会经济因素影响并决定现实的代际距离已经有所察觉,而且对经济变迁将进一步拉开代际距离的预测有了同一的认可,或者说,给予了价值肯定。(2)赞成者中,我们发现青年人的比例(约45%)明显低于成年人(中年、老年人的比例都在60%以上),调查结果与我们的想象相背离。我们原以为,随着变迁的加速,青年人的代沟意识会日益增加并将强于老年和中年人,但调查结果显示了某种逆向的迹象。经进一步分析,我们不难看到,年龄较小的青年(25岁以下)所表现出的赞同倾向要大大弱于年龄稍大的青年(25—35岁之间,这些青年大多已结婚)。问卷中25岁以上的青年占青年总数的2/3,而其中又尤以大学生、中学生居多。这部分青年对家庭、长辈的依赖性都较强烈。尤其是大学生中的女性,思乡念家的情愫更为浓烈,这种因背井离乡而产生的眷恋之情自然而然会裹挟在我们进行调查的各个问题的反应中。此外,受阅历的局限,年龄较小者缺乏老年长者所具有的那种代际距离远近的历史对比经历,从而表现出对代际距离及其变化等概念的无所适从或不够敏感,这恐怕也是造成背离的原因之一吧。与青年人不同,年长一辈,尤其老年人经历过人生的风风雨雨,经济腾飞使他们以往为之骄傲并积累下来的经验很快成为过去,新一代的超越和先进增添了他们晚年的孤独、寂寞和失落,他们不得不为之感叹并时刻对代

际距离给予敏感的关注。实际上，多有老年人看不惯青年人的话茬，比如鲁迅时代就有过“一代不如一代”的九斤老太的叹息。如此一想，在形式上出现上述背离似乎又是情理之中的事。

作为“代沟意识和评价”的最后一道题，我们是这样提及的：“如果条件允许，已婚子女应该与父母分开居住”您是否赞成？回答十分令人满意。（见问题6“K”）约80%左右的被试对这一说法持赞成态度，其中青年占77.3%（均值3.60、标准差1.30），中年人占85%（均值4.37、标准差1.21），老年人占83%（均值4.29、标准差1.17）。数据表明三点：首先，扩大家庭模式向核心家庭模式演变的趋势得到了三代人的共同认可。不愿意过几代同堂的生活，反映代际之间或多或少有了差距和矛盾，也就是说，代沟现象在家庭乃至社会上客观存在的事实已经被验证。其次，“赞成”者之中，中年一代居最高比例和均值，显示出他们不愿隔代同居的期望值最高。这与他们在现实的代际关系中所处的窘困地位颇相吻合。亦父母亦子女的中年人在两个方向保持着代际接触，既跟父母亲接触，又跟子女接触，他们担负起满足年轻一代和老年一代不同需求的职责。在这样的代际关系结构中，他们所受的压力最大，给出的最多而得到的最少，还常常有许多被迫左右逢迎的难言之隐。因此，逃脱这种困境在中年一代中尤为迫切。最后，由于条件所迫而困居一屋的几代人如此这般地渴望自由独居的现象，应该说，这与西方青年以18岁离家独立为自豪的心态十分相似。那么，中国的未来是否也是这样呢？我们认为，虽然不能全盘照搬西方的模式，但是接受这一点已经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而且它也不失为一种跨越代沟、弥合隔阂的绝好措施之一，因为它似乎内含着某些“近不亲远亲”的道理。前面分析的大学生离家之后萌发的恋父母情结就能充分说明这一点。

2. 不同代人在价值观和行为选择方面的差异

问题4. 在人生价值观方面的差异

	16—35岁 (N=163)		36—50岁 (N=100)		50岁以上 (N=82)		Ri
	频数	等级 X	频数	等级 Y	频数	等级 Z	
12. 您认为人生的最大幸福是什么							
——健康的身体	34	2	25	2	26	1	5
——理想的工作	9	6	5	7	2	6.5	19.5
——对社会做贡献	10	5	10	3	18	2	10
——幸福的家庭	46	1	28	1	11	4	6
——个人的成就	24	3	8	6	2	6.5	15.5
——稳定的社会环境	7	8	9	4.5	6	5	13.5
——其他	6	9	2	9	0	9	27

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分别为

- (青年与中年) $r_{xy} = 0.81$
- (青年与老年) $r_{xz} = 0.62$
- (中年与老年) $r_{yz} = 0.91$

肯德尔和谐系数告诉我们，三代人对人生幸福观的评价虽然一致性程度尚好，但彼此间还是存在差异的。为此，我们进一步对三对主体互动范式进行了斯皮尔曼相关分析以鉴别不同的差异程度。结果表明，青年人与老年人的等级相关系数最小， r_{xz} 为 0.62，说明青年与老年之间的差异程度最大；其次是青年与中年之间的差异， r_{xy} =0.81；中年人与老年人则表现了很高的评判一致性， r_{yz} =0.91。

实际的选择亦确实如此。所列的 10 项人生幸福评价对象中得到青年肯定的前三位顺序为：“幸福的家庭”、“健康的身体”和“个人的成就”。显然，首选的几项都是以个人幸福为主要内容的，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来解释的话，当代中国青年的自我实现需要极为强烈。因为我们同时发现，“为社会做贡献”这一项并没有得到青年较强烈的价值肯定。而且在问题 6 (c) 中，对“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而不在于索取”一问，青年答“不太赞成”与“说不准”的比例最高。因此说，青年对人生价值的理解多倾向于满足个体的需要和完美的自我实现。

中年人与青年人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的首选两位与青年人相同，第一是“幸福的家庭”，第二为“健康的身体”。如果说青年对“幸福的家庭”的企盼还处于营造家庭的幻梦和颠簸阶段的话，那么中年人则出于一种成熟的思考和感受。至于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与否，则可能主要与中年人肩负家庭、事业两副重担有关。这里的“事业”，除去个人的成就以外，还含有较多社会、集体事业的成份。作出这番判断的依据似乎随意可见，比如，与青年不同，中年者选定的第三位是“对社会做贡献”而非“个人的成就”，紧随其后而且只与第三选择相差无几的第四取向为“稳定的社会环境”与“良好的人际关系”，这多少说明中年一代具有较高的关注社会、关注社会环境和人际关系氛围的倾向。再比如，对“人生的价值是在于奉献而不在于索取”的说法，中年人大多数取“赞成”的态度，在这方面他们与老年人的观点基本一致。因此说，中年一代作为年轻一代与老年一代的中介，他们所持的人生价值观结合了上下两代人的特征，这就是将个人与社会或国家利益兼顾视为自身幸福人生的标记。

老年一代——不论是打江山缔造新中国的一代，还是与新中国同步成长的一代，最集中、最高度地体现了“奉献”精神。集体大于个人、排斥个人选择、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置于社会的要求之下是大多数老一辈延续至今的固定的思维方式。我们看到，对幸福人生的评价中，列前三位的是“健康的身体”、“对社会做贡献”和“稳定的社会环境”。而在“人生价值在于奉献”的态度测量中，72%的老年人持赞成取向，位居三代人之首，与青年人的抉择形成鲜明的对比或差异。

问题 5. 消费行为方面的差异

	16—35 岁 (N=163)		36—50 岁 (N=100)		50 岁以上 (N=82)	
	频数	(%)	频数	(%)	频数	(%)
13. 假如条件允许，您已经有了好几套可以替换的服装，偶尔上街，又看见一件十分中意的服装，您怎么办？						
——立即买下	70	(42.94)	17	(17)	7	(8.54)
——犹豫不决	52	(31.90)	24	(24)	11	(13.41)
——不买	41	(25.16)	59	(59)	64	(78.05)

问题 6. 对若干观点的态度测量

得分% 得分平均值、 标准差	16~35岁 (N=163)					35~50岁 (N=100)					50岁以上 (N=82)					年龄对态度的 影响(卡方检定)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平均值标准差	X ²	df	显著程度 P 值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 改革还应该加大力度	45.4	29.4	17.8	4.9	2.5	4.10	0.91	41	24	19	6	10	3.80	1.30	29.3	35.4	19.5	11.0	4.8	3.73	1.44	20.98	8	0.01-0.005
· 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 而不在于索取	27.6	19.6	19.0	18.0	15.8	3.25	1.43	31	30	16	16	7	3.62	1.26	34.2	26.8	22.0	7.3	9.7	3.68	1.28	12.38	8	0.25-0.1
· 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而 不在于索取	23.3	19.0	15.0	31.3	10.4	3.14	1.35	31	21	14	17	17	3.32	1.48	42.7	29.3	13.4	12.2	2.4	3.98	1.13	19.73	8	<0.005
· 收入差别还是小一点好	17.2	22.7	11.0	20.9	28.2	2.80	1.49	36	25	9	17	13	3.54	1.45	57.3	15.9	6.1	15.9	4.8	4.05	1.14	50.35	8	<<0.005
· 只要能挣钱,干什么 工作都行	6.8	11.0	8.0	25.8	48.4	2.09	1.24	11	13	7	22	47	2.19	1.42	13.4	6.1	2.4	29.3	48.8	2.06	1.40	5.32	8	0.75-0.50
· 缺乏竞争冒险的生活 没有意思	30.1	28.2	15.3	14.1	12.3	3.50	1.37	10	25	19	28	18	2.81	1.27	11.0	19.5	18.3	18.3	32.9	2.57	1.40	34.92	8	<0.05
· 以后的事多想也没有 用。	19.0	22.1	9.2	22.1	27.6	2.83	1.51	29	25	4	22	20	3.21	1.54	40.2	20.7	0	20.7	18.4	3.44	1.60	21.31	8	0.01-0.005
· 只能“到哪山砍哪柴” · 能挣会花是一种现代 生活风格	26.3	31.3	10.4	18.4	13.6	3.39	1.39	22	25	6	17	30	2.92	1.59	11.0	12.2	9.8	32.9	31.7	2.30	1.33	35.3	8	<0.005
· 男女间婚前性行为是可 以理解的	23.3	31.3	20.9	11.7	12.8	3.41	1.32	8	11	14	24	43	2.17	1.49	4.9	6.1	7.3	17.1	64.6	1.70	1.14	98.71	8	<<0.005
· 离婚总是不幸的,凑合着 总比离婚好	6.7	9.2	6.1	25.2	52.8	1.92	1.25	10	23	8	19	40	2.44	1.46	31.7	19.5	14.6	15.9	18.3	3.30	1.50	57.74	8	<<0.005
· 如果条件允许,已婚子 女应该与父母分开居住	59.5	17.8	11.0	8.0	3.7	3.60	1.30	71	14	4	3	8	4.37	1.21	64.6	18.3	3.7	8.5	4.9	4.29	1.17	15.18	8	0.1-0.05

调查显示,不同代间在消费行为的选择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如果将消费结构区分为生存型、发展变化型和享受型三种层次的话,各代似乎又分别处在不同的消费需求层次上。青年人回答“立即买下”和“犹豫不决”的比率最高,基本从属发展变化型与享受型之列。而中、老年人购买欲弱,回答“不买”者占其比例最多,其中老年人占78.05%,中年相对较少,占59%,低于老年的比率。假如将老年一辈归为生存型的话,那么中年群体处于生存型和发展型之间。可见,消费意识的强弱与年龄大小成反比。

由于一定的消费行为总是象征着某种生活风格,因此我们的调查还对“能挣会花是一种现代生活风格”的说法进行了态度测量。调查的结果见问题“8H”。大部分青年对这一说法的“赞成”态度较明朗,平均值为3.39,说明这一观念已经在青年的价值天平上占有一席之地。中年人的均值为2.92,不足“3”但极度接近“3”,再由标准差为1.59可知其分布的离散程度较高,因此大部分中年人还处在是接纳还是拒绝这一观念的犹豫和矛盾之中。而老年一代此项选择的均值只有2.3,标准差1.33,因此,老年人明显对这一说法持“不赞成”态度。这与上述调查结果相吻合,年龄越低的青年越可能对这种说法表示赞同,尽管这些赞同者(如低龄青年、学生或专业人员)的实际收入并不比那些对此表示不赞同态度的年长者更高,但作为一种观念和生活风格,能挣会花却已经被接受或获得了认同。由此而导致的青年实际消费行为与其实际收入之间的脱节,常被社会主导观念尤其老年人的观念,视作为“不正常”或“混乱”,应该“加以引导”。实际上,这与现实生活水平的提高、市场经济以及消费观念的突破等密切相关,同时它也是转型的一个方面。具体而言,当整个社会正由温饱型逐步迈向小康的时候,消费结构将由生存型向发展型和享受型转变。

问题6第A—K题是我们设计的态度测量题,它显示被调查者所持的价值尺度的明确程度以及对其现实行为可能具有的影响。本调查的态度度量内容涉及到若干价值观念,分别以“不赞成、不太赞成、说不准、基本赞成和赞成”作为度量等级,并顺序记1、2、3、4、5分,得分平均值以“3分”为界,越高表示越是肯定和良性评价的选择,越低表示越是否定或恶性评价的选择。

有关B、C、H、K所述的观点,其评价在前面我们已经有过阐述,除此而外,问题6表中提供的数据还可以说明以下几个问题:

(1)对改革的看法。1978年以来,改革成为中国社会现实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得到了三代人的共同赞誉和拥护。就“改革还应该加大力度”一说,青年投赞成票的人数最多,其得分平均值为4.10,明显高于中、老年,标准差仅为0.91,又低于其他两代。这说明年龄越低对改革事务的关注程度越高,对改革参与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的评价越坚定。改革造成的社会连带性后果是极其广泛而深刻的,“破大锅饭,出现收入差别”便是其中一例。与青年强烈期望加快改革步伐的态度相应,我们发现,“收入差别还是小一点好”这一体现平均主义的标准并不被青年所看重。相反,中、老年人,特别是老年人,却对此说持高肯定态度。老年人的均值为4.05,明显赞成大锅饭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中年者为3.54,也持赞成看法,但青年人赞成此说的均值小于3分,为2.08不赞成倾向居多。(见问题的列表)这里,老年人的“怀旧”、中年人的“求稳”和青年人的“创新变革”心态形成了较为鲜明的比照。从中,我们不难窥视到三代人对现实生活中经济地位不平等现象的认识倾向,即代与代之间“经济不平等”,亦即代际间存在着拥有性代沟现象。以老年人与青年人对此项的选择差别而论,老年人的“怀旧”,可能与目前社会上大批青年有能力直接投入各项经济活动并逐步形成高收入

阶层的状况以及他们对这些小字辈富裕者的生财之道是否合法合理的怀疑有关。而年轻一代对“收入差别”的接纳,很可能出自他们对过去乃至现在自身经济地位和收入水平的不满意。

(2) 对挣钱和风险的态度。一方面,年轻一代渴望改革能给他们带来公平的竞争挣钱机会。另一方面,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却对“只要能挣钱,干什么工作都行”的说法持一定的保留态度,“不赞成”者接近75%,认为收入不是选择工作的唯一标准,不该时时或无休止地追求金钱。这意味着,职业活动的崇高的社会意义或实现自我的理想境界,在青年心目中依然较为浓烈。这项选择,青、老年人没有显著的差异;(问题6“E”)中年者的得分平均值为2.19,略高于青年与老年,而且标准差偏高,说明部分中年人更多地从生计角度或挣钱角度来选择职业,应该说,这与他们的社会境况是相符的。在今天商品经济的大潮中,“挣钱”与“风险”常常表现出连带关系,那么,青年人对挣钱的冷漠,是否会连带其风险意识的薄弱呢?答案是否定的。通过对“缺乏竞争冒险的生活没有意思”这一观点的态度测试,我们发现,三代人的风险意识颇有差异:青年人对风险具有积极、肯定的倾向,答案中持积极见解的占优势;老年一辈对竞争风险具有消极、否定的倾向,得分均值2.57,说明持不赞成态度者占多数;中年一代对风险生活的态度基本在“不太赞成”和“基本赞成”之间游移,其中“不太赞成”的倾向略高。(问题6“F”)

(3) 对未来的看法。在我们的问卷调查中,对“以后的事多想也没有用,只能到哪山,砍哪山柴”,表示赞成的比率最高为老年人,占60.9%,其次是中年者,占44%,青年占41%;表示不赞成的比率,青年人最高,占49.7%,其次是中年和老年人。资料搜集的结果说明,三代人对未来如何、是否需有计划性的考虑不尽相同。相比之下,青年人对自己主宰未来的能力较有信心,计划性大于盲目性,对命运的归因程度明显低于年长一辈,换言之,他们对未来事物的考虑以及与未来的联系更多一些,体现着现代人的特征。老年人赞成“到哪山砍哪山柴”和“走一步算一步”的说法,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依从现状和命运的特点,这显然与他们的宿命倾向以及生理衰老极有关联。如果说老年一代代表过去的话,那么,最贴近现实的是中年一代。由表可知,他们对此说的价值天平在“赞成”和“不赞成”间摆动之后略偏向“赞成”一方,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作为社会特殊身份的的中年人对诸多客观因素难以把握而产生一定程度的无能为力感,但又不甘于对现实境遇作无条件的屈从。于是,抗争和无力交织铸造出中年一代注重现实又不得不应付现实的特性。

(4) 对婚恋的态度。婚恋性爱常常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话题。有人认为,这十多年,价值观及其取向变化最大、最显著的方面当属婚恋性爱价值观及其取向。鉴此,我们的态度测量涉及了婚前性行为、离婚这两方面的内容。从观念层次上看,青年人对“男女间婚前性行为是可以理解的持基本赞成态度,(见问题“I”)这种宽容态度与婚前性行为的实践在青年中呈普遍蔓延趋势相吻合。略加细致一些,我们还发现,青年中作“赞成”评价的多为25岁以上者,而25岁以下的青年多处在“说不准”、“不太赞成”阶段,这可能与年龄较小者没有恋爱经历有关。另外,男性和女性的评价不尽一致,男性青年多持“可以理解”评价,而女性青年则更倾向于“不赞成”评价。与青年人不同,67%的中年人和82%的老年人对“婚前性行为”持否定观点,说明年长者中占绝大多数的人更多地依从社会传统观念所体现的价值准则,更多地屈服于社会舆论的监督和制约。同样,对离婚现象的评价各代人也大相径庭。我们就当代离婚率上升的现象设置了一个问题:“离婚总是不幸的,凑合着也比离婚好”,老、中、青三代对此的回答平均值分别为:青年1.92,中年2.44,老年3.30。以“3分”为界,唯

独老年一代均值大于3,表示出“赞成”倾向,也就是认为凑合着过日子总比离婚强的人占大多数。中年与青年相比,虽然两种年龄层次的人都对这一观点持反对取向,但是中年一代的得分均值和离散程度都高于年轻一代,因此说,青年人反对的程度更高一些,他们更注重婚姻中的感情因素。这也从另一侧面说明,恩格斯的名言“没有感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已经得到了青年一代的绝对认同。

为了使我们的统计推断能进一步脱出思维推理的藩篱,更具科学性和准确性,我们还对问题所列的各观点及态度进行卡方检定,以确定年龄与态度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对若干观点不同代人的态度是否有真实差异进行考验。首先假定年龄与态度二者是不相关的,显著程度为0.05,检定结果如问题6右表所示:对B、E、K观点的态度与人们的年龄是不相关的($P>0.05$),也就是说,三代人对这三种观点的态度没有显著的差异,取得了较为一致地认同。B项观点“经济腾飞会使不同代之间的差距拉大”,得到了三代人的共同默许和承认,表明人们对经济变迁之后可能加大代沟已经有了较为充分的心理准备或承受力;E项的认同,说明在商潮中,中国人只注重金钱交易的时代还没有出现;而K项态度方面的相仿,则以隐晦的方式暗示:“日常生活中代际间的不利与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否则,各代人要求独居的心态不会如此一致的强烈。除此而外的其他8项观点,各年龄段的人表现出了显著的差异(P 值 <0.05),尤其对D、I、J观点的态度三代人迥然相异(P 值 $<<0.05$, χ^2 的值大于50)。对这些分歧的分析前面我们已经有过阐释,此处不再赘述。总而言之,卡方检定的结果表明,出生年代不同(年龄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价值观和行为取向,年龄在人们的价值认同和行为方式的抉择方面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作用。

二

在发放问卷具体展开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又对少数调查对象进行了深入访谈,访谈时间一般为半小时左右。

1. 代沟现象

拥有性代沟现象集中表现在两方面,即经济地位的差异以及知识与经验的矛盾。拥有不同的经济地位,过去一贯是青年一代叫屈的“专利”。随着社会的转型,叫屈的主体现在已经发生了逆转或存在逆转的迹象。例如,一位曾经在工厂车间里担任过党支部的退休老工人说,厂里效益不好,他退下来以后在外单位做工,虽然收入是原来在厂里的2倍,但是这却无法弥补他内心的失落。因为现在他所做工作与年轻人、中年人相同,甚至从尽心尽责、劳动量来看往往强于在职的青壮年,可是收入仅仅是他们的一半。对此,他极度愤慨,并常常将这种不满转嫁到自己的子女身上:“我得经常教育、教育他们。”另一位因丈夫早逝而一直与儿子一家共同生活的七旬老人,她呈现给我们的是位含辛茹苦、事无巨细地操劳的传统母亲形象。访谈开始后,她的第一句话是“我每天很累、很累!”接下来便是一长串絮絮叨叨的家事叙述。当问及“您是否情愿这样辛苦地忙碌”时,她几乎不加思索地告诉我:“没有办法,我没有经济收入,全靠儿女们养我。”言下之意,在这个家庭中她因为没有经济地位,就必须付出每日的艰辛,来达到自身心理上的平衡或博得晚辈们的尊敬。

就象社会的转型不会一朝一夕顷刻间完成那样,中国人依长幼之序论事论理的传统也不会转眼即逝。虽然目前存在着表明经济收入差异逆转的种种迹象,但是就整个社会的综合经济地位而言,老人占主导地位的局面仍然是社会的主要方面,论资排辈随处可见。在大量主

要以工资收入为其生活来源的各阶层人员中，青年人的收入理所当然低于长者，青年人的住房迟迟得不到落实，青年人的晋升遥遥无期等等，这一切问题虽说表面上只与年轻人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殊不知它的后果引发了不少家庭中的代际冲突。一例个案里，一位退休后受几个单位聘用的老知识分子不悦地说：“因为每月收入较好，我很情愿对儿孙们作一点补贴，可是日子久了，这些孩子非但无感激、体贴之情，反而养成了习惯，给他们少了点就不高兴，甚至闹意见、反目，实在叫人伤心！”另一例个案里，老夫妻俩有4个儿子，为了照应在身边的和不在身边的儿孙们的饮食起居，整天忙碌不停，还经常遭受指责。他们哀叹道：“有时候，我们真想狠狠心，撒手不管，可是又恐怕从此一刀两断，再说他们也确实各有难处……。”还有一例个案里，一位老干部十分不满地向我们数落他的晚辈，他认为，现在中国的年轻人既不如他们当年，也不如今天的西方年轻者。当年因为家境贫寒，他们年纪轻轻便走南闯北、自谋生路了，从来不依赖父母。西方的青年大多数18岁就开始独立生活。“而我的孩子都已经三、四十岁了，还什么事都靠着我。”这里，只述说了三位老人的不满，其实，由青年“刮老”现象引起的上下代之间的矛盾如今在中国的各家庭中已经屡见不鲜。这种现象出现的根源首先在于青年整体的经济地位低下，比如，青工收入微薄请不起保姆带孩子，没有住房不能独居自立等。另一方面，我们认为，“刮老”现象之所以会引起越来越多的老人们的不满，是因为老人的观念也在社会的转型中发生了变化，那种“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的观念以及忙儿忙孙、终生操劳的生活已经不被老人（尤其城市老人）们所崇尚。

知识和经验的矛盾主要指青年拥有的知识与老年积累的经验之间发生的抵触。在我们的走访中，当问及“您家中的家电操作及维护，首先或主要由谁承担？”这一问题时，被访户里竟无一例是由五、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来操作或维护的，多半由稍年轻的中、青年人担当。再比如，在洗衣机已经相当普及的今天，仍有不少老人固守他们用手搓衣的经验，非但拒绝或不会用这类省时省力的机器，还不时地搬出“手洗衣服干净”、“省电也省水”、“不伤衣服”等老观念来训导青年，并指责他们“懒惰”。这在青年看来多少是令人啼笑皆非、不合时宜的。

选择性代沟现象的落脚点是不同代人在价值观和行为取向方面存在的差异或矛盾等。有关它的内容，我们在第一部分问卷的分析和描述中已经作过许多阐述和论证，限于篇幅此处不再补充个案。总而言之，世代间的隔阂几乎发生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家庭中亲子关系是这样，社会上干群关系、同事关系、分配关系以及人事关系等一切复杂的人际关系中都或多或少带有代际矛盾的色彩：政治思想工作难做、群体凝聚力不强、同辈小团体的出现、老人对中青年者执政的怀疑以及领导的指挥不灵等现象时有发生。笔者认为，就连近年来出现的“出国热”、“经商热”和“孔雀东南飞”现象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代沟现象。可以这样说，青年的出国、跳槽经商或南下的举动，可能与那里的经济诱惑极有关系，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或主要的因素。据了解，相当大的一部分原因应该归咎于青年自身躲避代压力、向往自由并期望能施展才华的动机。

2. 代沟特征

调查所涉范围内的代沟现象显示下列特征。

首先，肯定的社会价值（文化程度高、职业地位高、家庭背景好、收入高）与对代沟现象持理解、认可态度有正相关关系。一个案中，被访者为大学毕业后在某研究单位工作的年轻人，她说，虽然平时与母亲间有很多不一致的观点，但是凡事她总习惯与母亲商量，遇有矛盾，互相谈谈总能得到解决。另一个案里，被访者是位省级机关的离休干部，拥某新点式

楼的整整一楼层（是由女儿买下的商品房），属于市内“上等家庭”。谈话中，老人并不否认自己与年轻人有差距，认为差距是由出生年代不同所致的。老人表示她本人十分理解当代青年的所作所为：“他们只要道德，干啥我都放心！比如，在家里办舞会、唱OK等，说实在的，我心里并不赞赏，但从来不予干预他们，孩子毕竟有孩子自己的生活！”

其次，年龄差距越大、文化程度相距越远，代沟现象越明显。由问卷统计资料和访谈印象可以清楚地知道：在代际互动的三个主体范式中，青年与老年之间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差异最大，相比之下，中年与青年、中年与老年之间的差别就小一些。其中，中年知识分子有观念超前、行为滞后的特征，这就是说，他们在观念上与年轻人接近，而在行为方式上却常表现出与老人的趋近。比如，在消费观念上，他们可能赞成“能挣会花”的生活风格，但在消费行为上，他们选择了节俭。他们可能在讲坛上、在文稿中对风险和竞争大加赞赏并跃跃欲试，但是真正辞职、下海者则寥寥无几。至于文化程度的差距引起的代沟现象，“某研究生不愿归家”一例便是明证。年龄、文化的差距，正反映了时代的差距。因此，时代的差距越大，即变迁越迅速，代沟越明显。

第三，代沟主体的非对称性。代沟的主体——青年和老年各自在互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对称的。在中国，年龄历来是尊卑的标准，长者在互动中处于主导地位，带有完整的既定互动计划和策略，引导并制约着代沟的发展方向及其量值。晚辈处于从属地位，没有明确的互动目的，尽管其亚文化具有较大的新颖性或创造性，但在代际互动中会自觉、不自觉地顺从长辈，使中国的代沟现象极富情感和理性的色彩。比如，代沟现象中，我们经常多见的是老年人对中年、对青年的指责和埋怨，或中年人看不惯青年人；青年者有时对自己的行为并没有意识到，即使意识到，多数人也常常采取“表面顺从，暗里我行我素”的回避方式。理性是占主导的，这就保证了当今中国代沟现象的良性性质。当然，这种“不自觉的顺从”也有其各代各执己见和互相对立的一面。

第四，中庸的民族性格对中国的代沟现象起着一定的调节作用。儒家把中庸看作是最高道德，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中庸之道有两重性，一方面它以“中和”为最高原则，主张维持现状、否定变革；另一方面它反对过与不及，不走极端，防止矛盾的激化。在维持代际间的和谐，特别在解决代际冲突时，中庸性格具有重要的意义。访问中，多数被访者对“如何解决代际矛盾”的问题持中庸之见，他们认为，双方通过协商、对话、求同存异是最好的解决方法。中国代际间长久以来很少产生激烈的冲突，不能不说与中国人性格中的中庸性有关。尽管时代和人的社会性格在变，但是传统文化的痕迹无论对社会、集体，对家庭、个人的影响都是不容忽视的。

第五，社会中不同代之间的代沟现象与个体人格转型中的边际现象相交织。边际现象是社会转型时，由新旧及中西文化碰撞、冲突、选择而导致社会人格普遍分裂、呈多变双重化的产物。由于变迁、转型的加剧，以及频繁的社会流动（农民进城、城市人“下海”、出国等），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里都涌现出许许多多的边际人。这些边际人一方面因为立足在两个社会形态（农耕社会与工业社会）、两种时代（政治时代与经济时代）以及两种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接壤处，其内心的茫然、失范和冲突正是社会不同代间的代沟现象在个体身上的具体表现；另一方面他们以年轻人或中年者为众，因此说到底边际人与传统人相分离，也是子代与父代的分裂。在物质生活方面，我们的国家正在由温饱向小康社会过渡，相对贫困却又面临开放时代日益丰富的物质消费选择。对待这种选择，一位被访的年轻人这样

说：每一次上街逛商店，遇上自己所喜爱的东西，买还是不买，我总是犹豫不决，有时为一件东西能上街好几趟都决定不了，“买吧”又觉得过于奢华消费，“不买吧”又觉得何必这样苦了自己。政治生活中也不乏边缘现象，比如，一位“老三届”的中年干部告诉我们，他们这一代人认识政治、接触政治是在两重社会背景交织下开始的：一方面他们目睹过1978年之前的一场场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劫难；另一方面他们又面临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出台之前的冲突、失范和无序，似乎又饱尝了新体制诞生前的阵痛。因此，当每一项政策出台的时候，作为具体部门执行者的他总是存有一系列“看看再说”的边缘情绪。

第六，在不同代人的对立中，青年一代开始在文化方面占优势，具体表现为文化反哺现象的出现。“文化反哺，其可能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表述是，它是在疾速的文化变迁时代所发生的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进行广泛的文化吸收的过程。”^①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这种独特的现象实质是社会化的主、客体的转换，是“反向社会化”过程，即由年轻一代将知识文化传递给他们的生活在世的前辈的过程。显然，反向社会化过程的出现意味着传统的基本社会化方式的转型和中断，一种单向的训导过程正在为一种双向的交流引导过程所代替。在日常生活中，这种由年轻一代所带动的变化几乎无处不在。比如，我们早晨走进晨练的场所访问正在练身的老人时，眼见着的“老年迪斯科”舞蹈，其节奏和疯狂程度绝不亚于年轻一代风行的“迪斯科”舞蹈。由青年率先穿着的牛仔装，曾经被年长一代视若“奇装异服”，现在已经加入了老年服饰行列，一位身着牛仔褲的老人说：“穿上它，觉得精神、年轻多了。”年轻一代对经济生活的直接参与，同样改变了或正在改变着年长一代对金钱的态度。无论是离休的还是退休的，身体健康的老人大多选择了既有利于国家也有利于个人的第二职业。问卷调查里，73%的老人对从事第二职业持赞成态度，几乎与青年的态度没有二致。行文至此，我们已经用较大的篇幅对代沟现象作了详细的实证分析和描述。研究所得的数据和案例基本证实了最初的研究假设：（1）在南京城区中代沟现象客观存在。（2）代沟现象得到了不同代人的认可和理解。（3）对代沟现象有影响的因素主要有年龄、文化程度及社会经济地位（收入、家庭背景、职业）。

参考文献：

1. [美] 玛格丽特·米德：《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 王雷主编：《跨越代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3. 张永杰、程远忠：《第四代人》，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
4. 费孝通：《生育制度》，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5. 陆建华：《来自青年的报告——当代青年价值观及其取向的演变》，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6. 李银河：《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7. 叶南客：《现代化与社会主义新人》，重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8. 李新华：《关于代际理论的手记之一·“代”的时代》，《当代青年研究》1986年第5期；
9. 周晓虹：《试论当代中国青年文化的反哺意义》，《青年界》1988年第1期。

责任编辑：唐 军

^① 周晓虹：《试论当代中国青年文化的反哺意义》，《青年研究》1988年第11期，第22页。